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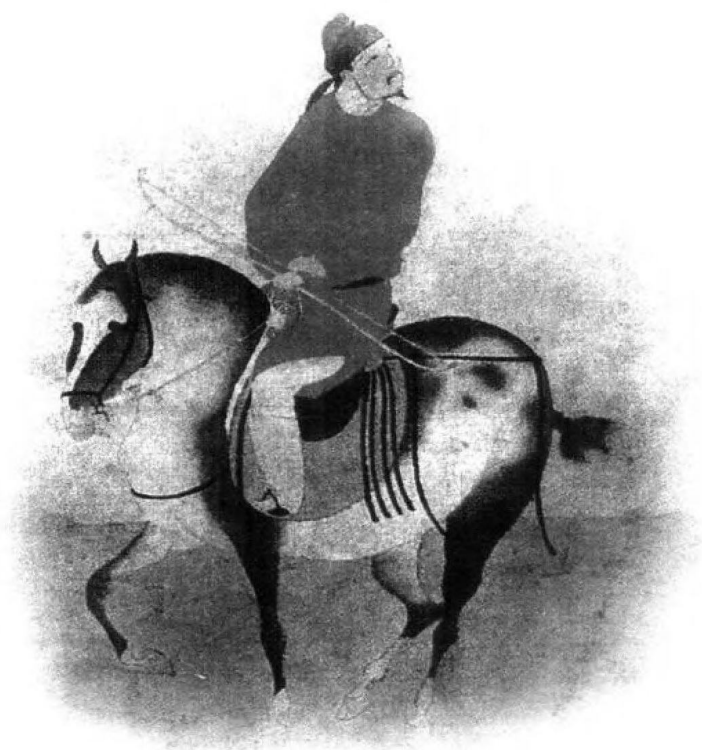
元朝史新論

王叔岷 署



啟慶 著

元朝史新論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元朝史新論 / 蕭啓慶著 — 一初版

— 臺北市：允晨文化〔民88〕

面：公分 — —（允晨叢刊：78）

ISBN 957-9449-91-0（平裝）

1. 中國—歷史—元（1260-1368）

625.7

88005357

允晨叢書 78

元朝史新論

作者：蕭啓慶

發行人：廖志峰

主編：李怡慧

執行編輯：張仁

美術編輯：劉寶榮

法律顧問：蔡欽源、邱賢德律師

出版：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服務電話：(02) 2507-2606（代表號）

劃撥帳號：0554566-1

初版日期：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一日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字第2523號

電腦排版：極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製版：欣佑彩色製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欣佑彩色製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裝訂：協成裝訂行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號6樓

傳真電話：(02) 2507-4260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定價：新台幣400元

ISBN：957-9449-91-0

◆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

序 言

本書是筆者繼《元代史新探》、《蒙元史新研》之後的第三本論文結集，其中絕大多數的文章都是近五年來的作品。

近五年來，筆者的工作與生活皆發生甚大的變化。在此之前，棲遲國外凡三十年。旅美、旅星期間，雖然生活較為安適，卻是以講授近現代史為在大學的主要工作，蒙元史研究不過是課餘的副業。回國之後，遼金元史的教學與研究成為主要任務，研究與寫作的步伐也因而加速不少。本書各文便是五年辛勤的部分成果。

〈通論編〉六文較為宏觀，或係討論元代歷史的重大問題，或是帶有普及性質的綜論。

元朝是第一個由遊牧民族所肇建而統治全中國的征服王朝，也是中國史上的第三次大統一。〈元朝的統一與統合：以漢地、江南為中心〉是以元朝為例討論征服王朝時代的統一與統合問題與漢族王朝時代有何不同。此文指出元朝之滅金平宋並不是單純的中原王朝統一戰爭，而且是蒙古世界征服戰爭的一環。而其政權的最高目標是延續蒙古人的「少數統治」。由於元朝的統一中國及其政權的性格與各漢族王朝不同，前者所採鞏固統一及促進統合的政策亦與後者頗有歧異。元朝所採鞏固統一的政策著重因俗而治、多制並舉以及對不同的族群給予差別待遇。這些分化政策導致意識型態、政治參與、民族融合與社會階級等方面的統合程度不高。元朝顯然始

終未能跨越政治學者所謂「統合的門檻」。元朝的情形與近代亞非拉殖民政權頗為相似。近代殖民政權不僅極力維護白種人的特權，而且對治下各族群加以分化而不求統合，真正的統合在殖民統治終結之後才告開始。中原的再統合亦是在明代元興，「多數統治」恢復後才得實現。從這方面言之，蒙元可說是近代殖民政權的先驅，這也是日本侵華時代特別著重研究「異民族統治中國」經驗的原因。

由於元朝是一個征服王朝，而其統治對象則是一個多元族群社會。族群政策與族群關係因而成為元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內北國而外中國：元朝的族群政策與族群關係〉對元代的族群生態、族群政策與族際關係作一廣泛之檢討，顯示元朝族群政策之宗旨不在於族群和諧與統合的達致，而是在政治與文化方面對被征服民族採行壓制與分化。這一政策嚴重影響族群關係，造成各族群在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等方面的關係發生很大的落差。在社會、文化方面，元朝中期以後各族群已呈現融合之趨勢，但在政治、經濟方面，蒙古、色目與漢族間的關係始終以壓迫與剝削為主調，導致族群的對立與衝突，而元朝之覆亡與族群關係之惡化具有密切關聯。

蒙古征服與統治在亞歐各國皆造成或多或少的影響。俄國史家便曾熱烈爭辯：蒙古征服是否改變了俄國歷史發展的方向與國家社會的性質。可惜在中國史家中甚少見到此類爭議。過去史家往往著重蒙元統治對中原社會的近程衝擊，甚少注意到其對中國歷史發展

的長遠影響。〈蒙元統治對中國歷史發展影響的省思〉原是應第二屆中國邊疆史學術研討會之邀而作的一篇演講，旨在對相關論點作一檢討與思考。此文指出：蒙元統治對其後中國政治發展的影響大於對社會、文化與經濟的影響。在政治層面，蒙元統治似乎導致君臣關係及國家與人民關係的改變。一方面，蒙元的特殊政治文化結合宋朝以來中原君主專制增長的趨勢，造成明清時代的絕對專制與殘暴政治。另一方面，蒙古人對全國人力、物力絕對支配的觀念，配合中原官僚組織的效率加強了國家對社會的控制，影響及於明、清。在社會、文化與經濟等層面，蒙元統治的近程衝擊雖然不小，卻無深遠的影響。宋朝出現的若干屬於「近世」的特徵在明、清時代未能沿續，與蒙元統治似無太大關聯。總之，蒙元統治對中國歷史的影響是中國史上的重要課題，此文中之論點仍待進一步檢證，不過是一篇拋磚引玉之作。

〈中華福地，古月還家：蒙元興亡與讖緯〉是應《歷史月刊》之邀約而撰寫，刊登於該刊一九九五年九月〈讖緯與末世預言〉專輯。其時正是《一九九五年閏八月》一書造成台灣人心浮動之際。此文自蒙古薩滿思想與中原讖緯傳統顯示：蒙元之興亡皆與讖緯有關，不僅蒙元統治者利用讖緯來鞏固其政權，而元末群雄起事亦利用讖緯的魅力來震撼人心。讖緯與政治密不可分，漢族王朝與征服王朝時代並無二致。但元朝的異族起源則賦與「依舊中華福地，古月一陣還家」這類具有族群意含的讖言極大影響力。

「遺民」是中國歷代鼎革之際不可或缺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現

象。漢族王朝相互更迭之際，主導士人貞介自守的為儒家忠君思想，而元朝興亡之際遺民的處境與族王朝相互更迭時大不相同。元朝滅宋是「由夏入夷」，而元亡明興則是「由夷入夏」。無論「由夏入夷」或是「由夷入夏」皆具有統治族群更迭的意義。過去由於傳統「夷夏之辨」及近代民族主義的影響，「由夏入夷」各朝之遺民不僅受到重視，而且備受讚譽，而「由夷入夏」各朝之遺民則受到忽視與詆責。

〈宋元之際的遺民與貳臣〉與〈元明之際的蒙古色目遺民〉二文分別探討宋元與元明之際的遺民現象。〈宋元之際的遺民與貳臣〉一文係綜論宋元之際江南漢族人士對於朝代鼎革的種種反應。該文顯示：面臨宋元之際翻天覆地的變化，江南士大夫作出迥然不同的反應，有的遁跡山林，為故國守節，成為「遺民」，有的則改仕新朝，成為「貳臣」，而在遺民之中，政治光譜分佈亦頗寬廣，從心存復國，言詞激烈的「激烈型」到忠宋而不反元的「邊緣型」，態度相差甚大。遺民拒仕新朝主要係受絕對忠君觀念之影響，「夷夏之辨」所起作用不大。而且遺民現象之存在甚為短暫，前後不過二三十年。宋元之際的遺民似不如前輩學者所說的重要。

〈元明之際的蒙古色目遺民〉可說是遺民研究的另類思考，因為過去的遺民研究僅著重漢族王朝覆亡後漢族士人的動向，而此文則以元朝滅亡後蒙古、色目遺民的行為與思想為探討對象。蒙古、色目遺民與當時漢族遺民有相同之處，亦有相異之處。相同之處是各族遺民皆出身士大夫階層，而且皆因絕對忠君觀念的影響而拒仕

異代。不同之處是：蒙古、色目與漢族在元、明二朝所處地位不同，所受明太祖「本土化」政策之衝擊亦全然有異，因而蒙古、色目遺民的亡國之痛與眷懷故國之激情更甚於漢族遺民。蒙古、色目遺民雖無強烈的夷夏觀念，卻成為族群政治的犧牲品，與民國初年滿族遺民的處境有幾分相似，但有待進一步比較研究。

《專論編》五文係對元朝政治制度與社會文化的幾個重要層面作了較為深入的探究。科舉原是政治制度的一環，〈元代科舉與菁英流動：以元統元年進士為中心〉則是自社會史的觀點著眼。科舉的社會影響原是近幾十年來的一個重要研究範疇，但對元代科舉之研究皆未由此角度著眼，元朝遂成為科舉的社會史研究中的「失落連鎖」。此文或可部分彌補此一缺漏。元代科舉前後共有十六科，唯有元統元年留有完整的《進士錄》。十餘年前筆者曾發表〈元統元年進士錄校注〉一文，對該錄內容補正甚多。〈元代科舉與菁英流動〉即是以〈校注〉為根據，而以該科百名進士為分析對象，探討科舉制度與菁英流動之間的關係。本文從仕宦、戶計與婚姻三方面考察進士的家庭背景。自仕宦觀點言之，僅有35%之進士來自全無官宦傳統的家庭。但蒙古、色目、漢人、南人進士家庭官宦傳統的性質不盡相同，蒙古、色目進士大多出自高、中級官員之家，漢人進士皆出身中下級官宦家庭，而南人進士則為宋朝仕宦家庭的延伸。自進士家庭所屬戶計類別言之，出身軍戶的蒙古、色目、漢人進士之比率頗高，而南人進士則以儒戶出身者佔多數，反映出各族群社會結構的不同。自進士家庭的婚姻關係言之，蒙古、色目進士

多身與漢族姻婭相聯的家庭所佔比率甚高，而與漢人聯姻可能影響其子弟的文化取向。總之，元統元年進士中的「新血」的比率較宋、明二代為低，而各族群進士中新血的比率又因種種因素而頗有差異。不過，元統元年進士的統計未必能夠完全反映其他十五科的真相。筆者現已完成其他各科進士錄的重構，將另出新作以求呈現元朝科舉與菁英流動較為完整的面相。

關於元代各族群間的社會文化關係，雖然前輩陳垣早在七十年前即已出版《元西域人華化考》一書，但在一般印象中，蒙古、色目人漢化程度不高，與漢族往來無多。筆者十餘年前撰寫〈元代蒙古人的漢學〉時即已體認到：元朝雖有族群等級制度，但族群等級制度並不是箭內互與蒙思明所謂「種族階級制度」，與美國以前的「種族隔離」〈racial segregation〉及南非的apartheid更不相同，各族人士相互往來並無法律上的阻隔。元代中後期熟諳漢族士人文化的蒙古、色目人日益增多，業已形成一個士人階層，而此一新興的蒙古、色目士人階層並非孤立於漢族士人主流之外，而是基於共同的文化造詣、興趣與品味，與後者緊密結納，相互之間存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由於這一體認，筆者遂萌發了「多族士人圈」的概念。〈元朝多族士人圈的形成初探〉一文之宗旨即在證明元朝中期以後一個多族士人圈業已形成。本文顯示：元朝中期以後，各族士人透過姻戚、師生、座師、同年及同僚等關係，建立緊密的社會網絡，並且共同參與詩文唱酬、雅集遊宴、書畫題跋及著作編刊等文化活動，頻繁互動，各族士人乃能融為一體。多族士人圈之形成雖不能

改變元朝蒙古人「少數統治」的政治現實，卻為族群統合跨出重大的一步。

蒙元時代是中國史上前所少見的民族大遷徙與混居時代。在徙居中原的衆多蒙古、色目人中，系出畏兀兒族的高昌偃氏無疑是較為突出而有趣的一個家族。偃氏徙入中原之前早已位列突厥、回紇、畏兀兒等國國相長達五百年。遷入中原後，不僅躋身蒙古、色目仕宦階層，而且全面掌握漢族士大夫文化而成為當代最為出色的科舉世家。元亡之後，偃氏子孫在明朝仍不失為一官宦家族，而遷入韓國之一支更成為高麗、朝鮮二朝之外交與科舉世家，而且綿延至今，並有家譜可稽。〈蒙元時代高昌偃氏的仕宦與漢化〉一文較為全面地考述了偃氏在大蒙古國及元朝時代仕宦與漢化的歷史並兼及其在漠北、西域之背景及在明朝與韓國之發展。偃氏在各方面之成功固然超越當時絕大多數的蒙古、色目家族，為一特例。但其歷史為少數民族家族徙入中原後之適應與融合以及蒙古、色目菁英階層之轉變提供一個具體例證。今後偃氏在漠北、中原、西域之歷史已無多少探討之空間，而關於此一家族在韓國之發展，其中待發之覆仍多，卻非本文之重心。

元代蒙古、色目人所撰詩文集流傳至今者為數極少，任何失傳詩文集之重現皆應具有甚大意義。金哈刺《南遊寓興詩集》在中國失傳已久，唯一抄本長埋於日本內閣文庫書庫之中，為世人所忽視。筆者於六年前獲得此集影本，喜出望外，遂撰寫〈元色目文人金哈刺及其《南遊寓興詩集》〉一文。此文考述了金哈刺之族屬、

家世、科第、仕歷、詩集流傳及其文學價值，並進一步指出：金哈刺雖出身汪古族，在漢文化中卻浸潤極深。其詩歌所反映的生活、思想及情趣與漢族士大夫並無不同，在政治上卻與元室同舟一命，安危與共，最後不得不以身家殉國，反映出元季蒙古、色目菁英的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相互牴牾的困境。由於金哈刺為元季的一位重要色目詩人，其詩集之發現值得史學與文學學者之重視。大陸學者楊鐮在其新著《元西域詩人群體研究》中已對金哈刺作了重點評介，可見筆者此文已喚起文學史學者對金哈刺之重視，而哈刺在未來元代文學史論著中必將佔有重要的一頁。

溝通人員在多元族群、多元語文國家中之地位無疑極為重要。〈元代的通事與譯史：多元民族國家中的溝通人物〉即是從政治制度與社會史的角度考析譯職人員在蒙元時代的功能及其政治社會地位。本文顯示元代的譯職人員多數來自各族菁英家庭，而以對內溝通為其主要功能，而且在擔任譯職後即與職官主流匯為一體，享有不惡的政治前途。與漢族王朝時代譯職人員大多出身卑微，永沉於官僚組織之邊緣，並且以外交為其職能者大不相同，充分反映出元朝國家與社會的組成及運作與漢族王朝時代的巨大差異以及元朝對譯職人員的重視。

〈評介編〉中收入兩篇探討蒙元史研究發展與現狀的論文。〈凱撒的還給凱撒：從傳記論中外成吉思汗研究〉一文係自傳記探討二十世紀各國成吉思汗研究的發展。本文除評介幾部最為重要的成吉思汗傳記外，特別強調成吉思汗的政治爭議性，指出在歷時廿

年的中蘇之爭中，成吉思汗成為共產世界強權政治鬥爭的工具，而在其蒙古故土亦是命運坎坷，隨著蘇蒙與中蘇關係的變化幾經浮沉，可見成吉思汗研究受到意識形態與民族情結的嚴重扭曲。筆者希望，隨著共產世界的瓦解與後意識型態時代的來臨，「未來成吉思汗的傳記不僅應該打破意識型態的枷鎖，納入新史料、新研究，而且在英雄史觀與社會史觀之間取得平衡」，將歷史真面目還給這位蒙古凱撒。〈近五年來海峽兩岸元史研究的回顧〉是筆者繼《蒙元史新研》所收兩篇文章而作的另一篇對海峽兩岸元史研究發展的檢討。此文除逐類評介一九九二至一九九六年間兩岸的元史研究成果外，並表示了兩點感想：一方面為中國元史學的水平躍居世界前列感到高興，另一方面則為台灣元史研究與大陸之差距日益擴大而警惕，因而呼籲台灣元史界同仁應加倍努力。

綜觀集中諸文，可說是宏觀與微觀並容，研究與檢討兼顧。一個資深研究者固應繼續從事專題式探討，將其研究的前沿不斷向前推進，但也應不時登高眺遠，一方面綜合各家之言，為範疇內的重大的問題勾勒出比較全面的圖像，另一方面則應不斷檢討範疇的過去與現在以尋覓未來的研究方向。這幾方面的工作似乎是筆者過去幾年來努力之重點。

回顧廿世紀蒙元研究的歷史，筆者感到在方法與方向上都有了重大的改變。由於元史研究性質特殊，其發展的過程與中國史上其他各代不盡相同。元史研究的特殊性為：第一，元史研究的指涉架構是二元的，一為北亞史，一為中原史，元史研究因而有兩條主

線，一為探討元朝在中國史上的特殊性，一為考察其在中國史上的延續性。第二，少數民族史料及域外記載在元史研究中之重要性絕非其他各代可以比擬。史料語文之複雜導致崛興於三十年代的第一代學者偏重以語言學（philology）的方法從事於各種語文史料的比勘與譯釋以及名物的考證，可說是文本取向的。第二代以後之學者較為著重歷史重大問題與趨勢之探討，但在擇題方面比較偏重上述的第一條主線，即是橫向的探討草原傳統及外來文化衝擊所造成的元朝制度與文化上的特色。今後之元史研究顯然應該重視第二條主線，即是著重直向的研析元朝與前後各代之異同及其在中國歷史發展中的地位。這也是筆者個人未來努力的方向。

此書出版之日，正是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主辦的「海峽兩岸蒙元史學術討論會」召開之時。屆時兩岸三地的俊彥歡聚台北，不僅將陳現二十世紀蒙元史研究的最後碩果，或亦能顯示出新世紀來臨後蒙元史研究的方向。

此書承黃進興教授之紹介，吳東昇博士惠予付梓，得以與允晨再締書緣。張仁女士悉心編校，使本書能夠順利出版。家岳父王叔岷教授再度為我題簽，尤為此書增加光彩。在校對階段，清華大學博、碩士班許守泯、陳昭揚、唐惠美、洪麗珠、吳聲政、林欣慧等同學皆曾盡心盡力。謹此一併致謝。

蕭啓慶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謹識於清華大學歷史所

§ 目錄 §

(一) 通論編

壹、元朝的統一與統合：

以漢地、江南為中心 013

貳、內北國而外中國：

元朝的族群政策與族群關係 043

參、蒙元統治對中國歷史發展影響的省思 061

肆、中華福地，古月還家：

蒙元興亡與讖緯 083

伍、宋元之際的遺民與貳臣 099

陸、元明之際的蒙古色目遺民 119

(二) 專論編

柒、元代科舉與菁英流動：

以元統元年進士為中心 155

壹

元朝的統一與統合：

以漢地、江南為中心

一、導 言

中國歷史是一齣分分合合的連續劇，也是一闕漢胡爭鳴的交響曲。無論在這齣連續劇或這闕交響曲中，元朝的角色皆甚重要。

繼秦、隋二朝，元朝締造了中國史上的第三次大統一。自唐朝衰亡，中國陷於分裂與擾攘之中近四百年。先有五代十國之割據，後有宋遼夏及宋金夏的對峙與爭戰。南北對立，干戈不休的局面直至蒙元統一中國始告結束。蒙元版圖，「北踰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¹⁾，領土之大，超過漢唐盛時，奠定後來中國疆域的規模。

蒙元之崛起與統一中國，為北亞游牧及半游牧民族發展史上的一個巔峰，也是游牧民族與中原農耕民族關係史的新頁。過去的游牧民族中，匈奴、突厥、回紇皆保持草原游牧國家的性格，僅與漢族爭勝於邊陲。而鮮卑、契丹、女真等族雖然有志於中原，卻無法突破黃河或江淮天塹，僅能統治華北的半壁山河。蒙元則為第一個游牧民族所肇建而統治全中國的征服王朝。

元朝統一中國的過程，論著已多，不必贅敘⁽²⁾。本文旨在藉元

(1) 《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58〈地理一〉，頁1345。

(2) 關於元朝統一中國的過程，參看李天鳴，《宋元戰史》（台北食貨出版社，1988）；陳世松、匡裕徵等，《宋元戰爭史》（成都：四川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胡昭曦、鄭重華，《宋蒙（元）關係史》（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關於元朝統一的歷史意義，參看周良霄，〈元朝的統一在中國歷史上的意義〉，《文史知識》，1985年第3期，頁17-21；舒文，〈忽必烈平定南宋新論〉，《內蒙古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頁32-41。